

维柯《新科学》与人文主义思想

赵立坤, 杨 静

(湘潭大学 历史学院, 湖南 湘潭, 411005)

[摘要] 维柯是18世纪意大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其历史哲学、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等思想在世界近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维柯《新科学》中的民政世界、诗性智慧和天神意旨这三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其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维柯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的人文主义思想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开创了人文主义新局面。

[关键词] 维柯;《新科学》;诗性智慧;人文主义

[中图分类号] K546.33;B5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2-0064-05

Vico's *New Science* and Humanistic Thought

ZHAO Likun, YANG Jing

(College of Histor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005 China)

Abstract: Vico is a philosopher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of Italy in the 18th century, his history philosophy, culture philosophy, cultur anthropology and other ideas exerte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civil world, poetic wisdom and providence in Vico's *New Science* reflect his unique humanist thoughts. Vico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western humanist tradition, and his thought of humanism carried on the tradition of humanism in the west and opened a new situation of humanism.

Key words: Vico; *New Science*; poetic wisdom; humanism

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 1668-1744年),意大利启蒙时代的哲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主要著作有《新科学》《普遍法》《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及《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新科学》一共有3版,第3版为定本,于1744年出版,全名为《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在《新科学》中,维柯介绍了新科学的要素、原则和方法,然后论述了新科学的万能钥匙——诗性智慧。通过诗性智慧,维柯提出了一种新的不同于笛卡尔理性主义的知识模式——想象性的(imaginative)理解。基于这个想象性的理解的认知模式,维

柯在新科学中描绘了三个世界,即神的世界、自然世界和民政世界,其侧重点则为诸异教民族的民政世界。维柯试图通过《新科学》中对诸异教民族的历史过程和复归(演)过程及诗性智慧论述和分析,从而建立一门新的科学——有别于自然科学的一种人文科学或者社会科学。这正是维柯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英国历史学家阿伦·布洛克认为人文主义传统的内涵为“拒绝接受决定论或简化论关于人的观点,坚持认为人虽然并不享有完全的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掌握着选择的自由。”^{[1]298}可以说,维柯是18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杰出代表。

收稿日期: 2013-11-28

作者简介: 赵立坤(1956-),女,辽宁鞍山人,湘潭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近代世界文化史研究;

杨 静(1989-),女,湖南怀化人,湘潭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世界历史。

一 《新科学》的民政世界与人的主体地位

为了将民族世界和自然世界作对比,维柯使用民政世界(the civil world)来称呼民族世界。《新科学》主要涉及的是异教(gentile)民族,因而民政世界指的是异教民族的世界。维柯认为人在自然界中原本是兽,而在各民族的世界里他们才变成了人,因此,维柯又将民族世界称为人类世界。在《新科学》的民政世界里,“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只是罗马人或希腊人在法律和事迹方面在特定时期的特殊历史,而是(由于在杂多的发展形态中在可理解的实质上仍然现出一致性)由一种展现出一些永恒规律的理想性的历史,这些永恒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2]612}可见,世界历史文化是人创造的,人是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

维柯根据民族的诞生和发展历程,参照埃及人划分历史时代的方法,将民政世界的历史,以及在人类心智上的表现以三段论的模式描绘出来:即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人的时代这三个先后衔接的时代。神的时代实际上是人类的童年时代,这个时代的原始人因对自然界的无知而对一些自然引起的巨大事变产生出恐惧和惊惶时,抬头仰望到了天空,“于是他们把天空想象为一种像自己一样有生气的巨大躯体,把爆发雷电的天空叫做约夫(Jove,天帝),即所谓头等部落的第一个天神”,^{[3]189}从而产生了宗教崇拜。英雄时代开始于神的时代后期,原始先民中的强者征服弱者后,父主们建立各自的政权,开始了贵族政治。到了人的时代时,最终由平民登上了历史舞台,建立了君主政体或民众政体。而这三个时代有三种不同的自然本性,分别为诗性的或创造性的自然本性,它是神性的;英雄时代的,他们相信自己来源于天神;人的自然本性,它是理智的。由这三种本性产生出三种习俗,分别为带有宗教色彩的、暴躁且拘泥细节的和有责任感的。根据这三种习俗又产生出了三种自然法:第一种自然法为神的,由于那时的人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神或者神创造出来的,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依存于神;第二种为英雄的法,它是凭强有力的,同时又受到宗教限制;第三种为人道的法,它由充分发达的人的理智来进行判决的。由这三种法创建出三种民事政权或政体:神的政府、英雄的或贵族专政的政府和人道的政府。此外,为了便于人类交流这三种制度和便于辩护,分别形成了三种语

言和三种法学。三种语言分别为神的英雄语言、英雄们的徽纹和发音的语言。三种法学或(法的)智慧分别为神的智慧、英雄的法学和人道的法学。而法律则又有三种权威、三种理性和三种裁判相佐。三种权威分别为神的、英雄的和人的。神的不需要辩护理由,英雄的根据法律的正式条文,而人则依据实践经验和理智智慧。三种理性分别为神的理性、国家政权的理性和自然理性。三种裁判则分别为神的裁判、常规裁判和人道的裁判。可见,这些划分都是依据三个时代的特征来划分的,并且相互联系。

对于这三个时代,维柯认为最后一个时代即人的时代虽然是民族发展的顶峰,但同时又走向衰落和解体。由于个人主义的逐渐滋长,此时的人追求淫逸生活,成为毫无约束的情欲的奴隶,变得铺张浪费、贪婪、妒忌、骄横、说谎和爱慕虚荣等。这种无节制的自由导致了无政府状态,而这种普遍的混乱会导致君主专制,或者使其被更优秀的民族所征服,甚至使得文明重新被野蛮所取代。这样便造成了第一个周期的结束,自此之后又开始了新的历史循环,进入了神的时代。这便是维柯所说的复归(演)历程(recourse)。在这复归(演)历程中,历史依同样的次序即三个时代的先后次序再经历同样的各阶段。在维柯的民政世界里,无论在诸异教民族的历史进程还是其复归(演)历程中,人都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凭借诗性智慧创造了历史及文化。

二 《新科学》的诗性智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

诗性智慧(poetic wisdom)是《新科学》的核心思想。希腊原文Poesis(诗)的意义就是创造,因此“诗人”就是制作者或创造者。诗性智慧,是诗人或人类制度创造者的智慧,也就是创造性智慧。诗性智慧不同于玄奥智慧,它是凡俗智慧。这些“诗人们”是诸异教民族的原始人,他们的创造不同于上帝的创造,因为后者是凭其纯粹的智力认识事物并且创造事物;而诗人们虽然强壮而无知,但最终能够凭完全肉体方面的想象,以惊人的崇高气派创造事物。正是诗人们的这种强大的凭想象力的创造方式,使得诗性智慧成为新科学的万能钥匙。《新科学》第二卷专门论述了诗性智慧,它包括诗性玄学、诗性逻辑、诗性伦理、诗性经济、诗性政治、诗性历史、诗性物理、诗性天文、诗性时历和诗性地理。通过诗性玄学想象出了各种神;通过诗性逻辑发明

了各种语言和文字;通过诗性伦理创造出了英雄;通过诗性经济创建出了家族;通过诗性政治,诞生了各种政体和与之相关的国家、公民及法律;通过诗性物理确定了各种事物的起源全是神性的,同时使人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出了人们自己;通过诗性宇宙创造了神的世界;通过诗性天文,人们把诸行星和群星从地面移升到天上;通过诗性时历,确定了世界史各种起源的时历准则;通过诗性地理,扩大了人的地理观念。维柯诗性智慧的各门技艺和各门科学产生于同一个根源——想象出的粗糙的玄学,即一种诗性的玄学或创造性的玄学。这种凡俗智慧或创造性的诗性智慧为一切科学和哲学提供了根源和前提,它是人类在历史文化创造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体现。因此,诗性智慧的创造过程是诗人们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充分利用其记忆力和丰富的想象力来进行历史文化创造的过程。

《新科学》“发现真正的荷马”,是诗性智慧的一个例证,它是对诗性智慧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维柯认为荷马史诗里所包含的神话故事是符合当时历史特性的。维柯肯定了荷马在英雄史诗方面的无比才能,如亚里士多德所称赞的诗性的谎言和贺拉斯所称赞的擅长于创造英雄任务性格。此外,荷马粗俗野蛮的比喻、充满崇高热情的语句及运用记忆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富于表现力的堂皇典丽的风格都是其才能的表现。对于斯卡里格在他的《诗学》里发现的荷马的全部比喻都是从野兽和野蛮事物中取出来的,维柯认为这恰好表现了原始诗性本性,使《荷马史诗》更加真实。因此,他认为荷马是异教世界的最早的历史家,他的两部史诗应作为希腊部落自然法的两大宝库。维柯认为“神话故事在起源时都是些真实而严肃的叙述,因此 mythos (神话故事)的定义就是‘真实的叙述’”,^{[2]466}因为野蛮人虽然缺乏反思能力,但“不会虚构杜撰,因此,他们的作品自然真实、开朗、忠实、宽宏”。^{[2]468}他还认为最初的历史必然是诗性的历史,而诗人便是最初的历史家。因此,《荷马史诗》以及许多类似的神话故事,并不是幼稚的幻想,而是诸异教民族原始时期的诗性智慧的结晶,它们反映了人在历史文化创作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维柯认为荷马并不是具体的一个人,“他的盲目和他的贫穷,都是一般说书人或唱诗人的特征。他们都盲目,所以都叫做荷马(homeros)。他们有特别持久的记忆力”。^{[2]485-486}因此,荷马就是神话故事的精华——诗性人物性格。诗性人物性格是按当时全民族的

思维方式创造出来的,这便是当时神话故事的创作人充分发挥其想象力的成果。维柯十分欣赏荷马史诗中的诗性智慧,认为“荷马所写的英雄们在心情轻浮上像儿童,在想象力强烈上像妇女,在烈火般的愤怒上像莽撞的青年。”^{[2]472-473}发现真正的荷马即发现真正的历史,《新科学》中的神话故事和荷马史诗中的诗性智慧都是人充分运用想象力的结果,而人正是依据这种诗性智慧创造了历史。

三 《新科学》的天神意旨与人神关系

维柯认为是人凭诗性智慧创造了历史,而其认识和创造的假定前提是天神意旨(providence)。维柯的天神意旨不同于基督教的那种神意概念。在基督教神学中,神意指的是上帝对于他所爱的人类世界的圣知和圣治,而维柯的天神意旨是因原始人的无知而对自然界力量的恐惧通过想象创造出来的异教神的神意。天神意旨在整个人类世界的发展历程及复归(演)历程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原始人从雷鸣闪电中得到信仰创造出了天神,并且畏惧和敬仰神。由于宗教的节制,人们创建了正式的婚姻制,进而创建了家族,进行家族统治。在天神意旨的安排下,父主们实行独裁的一些确定的家族政体,而这些父主们具有英雄品德,即虔敬和审慎。等这些氏族父主们强大后,滥用法律进行残暴的统治,违背了天意。因而天意也就使平民起来反抗贵族,使原来被贵族独占的占卜权推广到平民,使贵族失去了统治的依附,从而产生了民众政体。但后来民众政体腐化,进入到无政府状态下的完全暴政或自由人民的毫无约束的自由。面对这种情况,天神意旨有三种解决方法:一是天意安排这些民族中出现强有力的可以进行独裁统治的君主;二是天意安排世界上其他强大的民族来实现君主独裁统治;三是天意使他们进行顽固的派系斗争和拼命内战,从而进入长期的野蛮生活,结果有些人兽化了,有些人回到原始人世界的那种朴素生活,变得信宗教、真诚和忠实了。从此,在天神意旨的安排下,民政世界开始了新的复归(演)历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神与人在历史中的关系,就如同设计人与制作者的关系一样”。^[4]天神意旨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的设计者,由它来安排制度方面的秩序,而人就按照天神意旨的安排来创造和实践。然而,维柯认为造成这种历史结果的“是心智而不是命运,因为他们这样做是经过选择的”。^{[2]624}因此,维柯并不是一个决定论或简化论者,正如伯林所说

的,“维柯不是一个首尾一贯的决定论者,他相信天意,天意决定我们的生活,但天意也赋予我们自由意志,虽然自由意志控制不了我们行为的结果(那还是全然由天意决定的)。”^[5]维柯的“天神意旨”中的人神关系不是绝对的,人具有天意赋予的选择的自由,但最终的结果还是由天意决定。维柯的这种天意决定是其强调对宗教虔诚的表现,因为“各世界民族在原始社会都靠宗教的需要和利益才建立起来而且维持下去,宗教是一切典章制度的起源”。^[6]而保持这种对宗教的虔诚之心才能对人的无限欲望和道德进行节制,这种虔诚自原始直到现代维持社会的稳定都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维柯的“天神意旨”认为人与天意相互作用,尤其强调人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及其认识和创造能力。“维柯虽笃信宗教,但他不是有神论者,他的《新科学》毕竟是一部‘人学’而非‘神学’,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他在费尔巴哈之前就已看出神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7]因此,《新科学》体现的是人类自身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虽然它由天意安排,但最终是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天神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因此,“天神意旨”“是一种假定的前提,是一条信仰”,^{[3]33-34}是一种人要试图拥有神的能力的信仰。由于“在天神身上,认识和创造就同是一回事”,^{[3]170}“天神意旨”便成了人类认识和创造的前提。对于人的认识和创造能力,维柯提出了“认识真理凭创造”的真理观,他指出“‘真理’与‘创造’是交互相应的(reciprocantur),或者用经院派的俗语来说,他们是相互转化的(convertuntur)”。^{[8]9-10}“真理就是创造本身,因而第一真理就在上帝那里,因为上帝是第一创造者”,^{[8]11}而“正如在知晓事物的同时安置和产生事物一样,人在认知事物的同时创造了它们。”^{[8]12}因此,在维柯看来,人类只能认识自己创造的真理,但是由于上帝是人对自然的恐惧而创造出来的,因而人也能获得上帝创造第一真理的能力。这正是维柯的一种看待人和宇宙的人文主义模式。

四 维柯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维柯的人文主义继承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统,吸收了17世纪科学革命中的培根经验主义和笛卡尔理性主义的思想成果,进而创造出其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维柯开启了人文主义的新起点,因而成为18世纪欧洲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维柯的人文主义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但

其又超过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范围,成为浪漫主义的先驱,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柯的思想与西方人文主义传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继承和发展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开创了人文主义的新局面。

第一,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比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更加丰富。阿伦布洛克曾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属于个人主义的,它既不是一种信条,也不是一种哲学信条……它所代表的思想,它对人的经验的价值和中心地位——用今天流行的拉丁文原文来说,即人的尊严——的坚持,力量是太大了”。^{[1]67}维柯的人文主义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那种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人是自己的主人且人凭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优越的境界并塑造自己的生活,这极大地捍卫了人的尊严且有利于人的价值的开掘。但是,他在强调人作用的同时还强调宗教对人的制约作用。他认为宗教信仰对人的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人应该对宗教具有虔诚之心以约束人类在道德方面的恣意妄为,从而维护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第二,维柯提高了人文学科的地位,是指出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之间分歧的第一人。维柯第一次揭示了自然科学领域与人文科学领域之间的巨大差别,这极大地促进了人文科学的发展。从古希腊学者一直到17世纪欧洲的笛卡尔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传统和感觉排斥在真理之外,因为它们所提供的只是带有偶然性的东西或事件。在笛卡尔看来,感性知觉是一种消极功能,认为“物体不是通过感官或者想象力的功能被领会,而是通过理智本身”,^[9]进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真理观。而维柯对笛卡尔的这种理性主义的真理观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认识真理凭创造”的真理观。根据维柯的真理观,民族世界(民政世界),即人类制度的世界,是由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这种世界的原理或原因“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3]159}因此,人能够在历史、语言等人文学科中认识和发现真理。与笛卡尔相反,维柯十分重视人的想象力,尤其是凭想象力创造出来的诗性智慧。他主张的是一种新的知识模式,即想象性的理解、解释,而不是笛卡尔理性主义强调的那种逻辑的推理。但是,维柯的人文主义并不反对自然科学,而是强调对人文科学的重视,“恰如笛卡尔给予厚爱的形而上学、神学、物理学等科学一样,他

把被笛卡儿鄙视的那些知识分支恢复了原貌:这些分支是历史、自然观察、人类和社会的经验知识、修辞和诗”。^[10]这样,在笛卡尔时代一直遭到忽视和鄙视的人文科学在维柯这里开始昂首挺胸,继续其在文化史中的步伐。

第三,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对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柯采用“内部的”、共鸣的视野,以想象、理解、直觉、同情、移情等方式理解远古历史,他的这一理解方式被德国历史主义发展起来,从而形成理解、同情的洞察力、直觉的同情、历史的移情等方式。而维柯在《新科学》中通过运用这些想象、理解等方式,指出传说是一个民族的神话故事,诗歌是一个民族的真实历史,这对赫尔德理解认识神话、诗歌等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赫尔德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维柯主张认知方式的多样性以及文化在价值上的多样性。他认为认识事物,不能像笛卡尔理性主义那样强调人的单一的凭理性去认识事物的认知方式,以及重视自然科学而贬低想象力的创造方式,而是理性的逻辑推理与感性的想象相结合。同时,维柯认为“每一种文化及其在每个阶段的价值,既是心理上的存在,又是客观事实,不管在不同文化之间还是同一种文化内部,它们都是不能比较和度量的。”^[11]维柯的这种思想被英国史学家伯林称为多元文化思想,他的这种多元文化思想对赫尔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赫尔德继承并发展了维柯的这种多元文化思想,他“承认文化和价值具有潜在的无限多样性,它们有着同样终极的价值,没有相互衡量的共同标准。”^[12]

维柯生活在以笛卡尔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启蒙时代,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但生活在人文主义气息浓厚的意大利那不勒斯的维柯继承了意大利人文主义传统,对17世纪盛行的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进行了反思,从而提出了诗性智慧。维柯的诗性智慧强调想象和诗意,是对诗性文化的赞扬。维柯强调人类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呼吁对诗性文化的重视,因为以荷马史诗中丰富的想象力为代表的这种诗性文化正是维柯所处的启蒙时代的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所忽视的。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丰富了启蒙时代的思

想,同时提高了人文学科的地位。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认为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且人在文化创造的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实际上从人与自然的最早的实践性关系开始,这与马克思的人是实践活动的主体及在实践活动中能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观点,大有异曲同工之处。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中对宗教的虔敬是对理性主义泛滥的预见,强调人在道德和价值方面的创造性。维柯的人文主义思想为其所处的启蒙时代注入了新的思想源泉,为世界近现代思想和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参考文献:

- [1]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 [2] 维柯.新科学:下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3] 维柯.新科学:上册[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4] 启良.史学与神学:西方历史哲学引论[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161.
- [5] 贾汉备格鲁.伯林谈话录[M].杨祯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72.
- [6] 朱光潜.美学文集:3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565.
- [7] 张广智.超越时空的对话——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张广智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00.
- [8] 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M].张小勇,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 [9] 勒内·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M].徐陶,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22-23.
- [10] 贝奈戴托·克罗齐.维柯的哲学[M].R·G·柯林伍德,译(英).陶秀璈,王立志,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5.
- [11] 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M].岳秀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82.
- [12]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26-27.

责任编辑:骆晓会